

# 基金小镇 开启京津冀财富管理新模式

■ 本报记者 刘蕾

“资本市场承载着改革梦想。”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过的话。

国策之下,万物谋变。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北京作为众多资源集结地,成为金融核心区的天然优势逐步显现。其中,“基金小镇”模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 基金管理规模超千亿

北京基金小镇建设于半年前开始启动。

2015年5月30日,北京市文资办、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与文资泰玺资本等单位,就基金小镇建设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7月30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北京基金小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正式出台,这标志着北京基金小镇进入到全面的筹建和招商启动阶段。

上述《意见》明确要求,简化办事流程,确保3个工作日内核发工商执照,且北京基金小镇管委会组建专门团队,接受入驻机构委托,免费为入驻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备案、审批、年报等事项。

此外,房山区政府还将提供包括现金奖励、购房优惠或补贴、租房优惠或补贴。同时,房山区设立总规模为10亿元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北京基金小镇作为房山区“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已成为区域积极转型的重要支点。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已经是很多区县的目标,纯粹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基金公司入驻是否可靠?”当《中国企业报》记者提出心里的疑惑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项目管理人员答道:“北京基金小镇可以解决后台支持不到位、办公成本居高不下、机构设置分散、基金业人员相互交流不方便等问题。通过全面配套、覆盖的方式打造完整的服务平台。”

北京天算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基金小镇的公司之一。

“北京其他地方的金融聚集区也不少,但主要是服务于央企及大型金融机构,没有完全针对投资金融领域的优惠政策。”天算复兴公司总经理钟



基金小镇作为房山特色小镇建设的一部分,引起各方关注

笑天表示,税赋高、得不到相应的政策及信息支持,一直是困扰因素之一。而基金小镇优惠的税收及政策支持,为入驻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

据了解,截至目前小镇已引进文资光大、国开城市发展基金、柒壹资本、追远财富等55家企业入驻,正在办理入驻企业30余家,洽商中企业近50家,基金管理规模逾1200亿元。

## 小镇建设热潮迭起

据资料显示,基金小镇模式最早起源于美国格林尼治小镇,这是目前全球较为成熟的基金小镇。在全镇百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已进驻全球近400家对冲基金总部,管理资产总额超1500亿美元,被誉为全球对冲基金“大本营”。

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私募基金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同花顺的数据报告表明,在欧美的发达国家,私募投资基金在其GDP中的份额已达到了4%—5%。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全球最重要的四大新兴产业,即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生物制药产业,均是通过私募基金和资本市场发现并推动成长起来的。

“虽然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发展势头强劲。”本报记者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了解到,截至2015年11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3705家,已备案私募基金22217只,管理规模为4.97万

亿元,私募基金从业人员43.9万人。

伴随着私募基金的快速发展,“格林尼治”模式开始在我国落地生根。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目前国内至少已有两个基金小镇在浙江投建,分别是嘉兴市的南湖基金小镇和杭州市的玉皇山南私募基金小镇。此外,四川宜宾南溪区也将投建私募基金小镇,九江共青城私募基金创新园区、杭州西溪谷等私募基金产业集聚区亦在筹建中。

随着基金小镇建设快马加鞭,发展效应也在逐步显现。统计显示,目前嘉兴南湖基金小镇已累计引进投资类企业认缴资金超过1000亿元,累计引进投资类企业800多家。而杭州玉皇山南私募基金小镇已入驻金融类企业160多家,主动管理资产规模同样超过1000亿元。

## 金融产业园 发挥辐射作用

种种迹象显示,签约筹建北京基金小镇可谓是天时地利。

近两年北京的私募基金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北京在证监会完成登记的私募股权管理机构3032家,管理资金总量1.5万亿人民币,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超过了全国的3成,居全国首位。

对比国内其他基金小镇,无论从市场条件、资源和人才条件,还是各方面资金看,都具备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北京市金融产业布局中,基金小镇将成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一个有效补充。”文资泰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景伟介绍,北京基金小镇地处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区域,不仅将有力带动北京和天津的发展,而且对于周边辐射区域的资金、资本的带动都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建设基金小镇显然已经是市场的必然。

“北京自身就是一个大品牌,全国影响力最大,所以北京基金小镇在地域上是外地一些基金小镇所不能比拟的。”钟笑天总经理认为,能够在北京注册,对于基金机构来说产生的品牌效应也是最大,这也是他们选择基金小镇的第一个原因。

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朝晨也曾在北京基金小镇的研讨会上表示,“现在北京基金小镇是今天的北京后花园,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的发展很可能就将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主场。”

据了解,北京基金小镇未来的产业定位包括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及相关金融产业链衍生服务机构。北京基金小镇作为高端金融产业园,凭借其天时地利的诸多优势,一方面将承接金融核心区域产业外溢,深入融合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发展,为北京的科技创新插上金融的翅膀;另一方面将突出金融创新引领的带动作用,助力构建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

# 苏州工业园广结高大上“朋友圈”

■ 本报记者 石岩

苏州工业园区在日前举办的中国(苏州)境外投资与服务高峰论坛上,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在内的多方,再次与苏州工业园签订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成立股权投资基金和一揽子融资计划方案等。

各大银行热心与苏州工业园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这已不是什么新闻。

据悉,国家开发银行早已和苏州工业园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在项目对接、政策咨询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此推动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建设,为企业的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创造条件。

## 企业热衷“搭载”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方案,该园区将依托中新合作优势,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作为一个产业“航母”,将对其他产业形成更强大的搭载能力。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中德工业4.0技术展示创新中心内,这个国内首条以展示和培训为主,带有全球领先的工业4.0技术的全自动流水线,将德国的先进制造理念落实于实际的操作流程,实现了“边做边学”的创新性教

育模式,帮助苏州工业园区制造型企业产业升级。

以园区内的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为例。作为博世集团在中国最大的全资子公司,其不仅是汽车部件的制造者,更像一个智能车间。工厂车间内的智能化场景处处可见,员工进出车间需要严格的身份认证,甚至人脸识别技术也已经在此应用。

谋求变革的不仅是这种发展十余年的“老牌”企业,一些新兴产业也在这里“扎根发芽”。在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苏州工业园也向高端制造业挺进。

专注于机器人系统和自动化焊接系统集成研发的北人机器人系统(苏州)有限公司成立3年来,销售额年年翻番。据不完全统计,工业园区的机器人产业相关公司已经形成产值超30亿元的产业规模。

近期,这个“朋友圈”又变大了。江苏康宁杰瑞、罗氏诊断、恒瑞医药、玉森新药等企业相继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工建设。同时,还涌现出“医药健康+物流”“医药健康+大数据”等新型业务模式。

## 老样本的新管理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州工业园已然成为全国工业园区成长的样本。

当初,园区创造性地设立了投资决策、审计和薪酬三个专业委员会,行使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的权责。从2012年开始,园区对国资国企实行分级、分类考核,国资国企整体市场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

而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不断弱化行政审批,全面推行标准化、规范化审批,变“严进、宽管、轻罚”为“宽进、严管、重罚”。

从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在园区服务中心的窗口就能“一次搞定”。“一个印章管审批”的“减法”,表明了“良好的经济机构,特别是公共部门,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从规划上,园区不断增加产业和城市融合互动的频率,在产业升级中实现城市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延伸;园区不仅是先进产业集聚区,又是现代化新城。

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通过城市化和现代化来支撑高端要素的集聚,园区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与城市现代化有机结合的新路。

## 战略合作再升级

随着国务院《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面世,苏州工业园以构筑“开放合

作示范平台、产业优化升级示范平台、国际化创新驱动示范平台、体制改革示范平台和城市综合治理示范平台”五大平台为战略目标,使园区似乎再次搭上了转型升级的“快轨”。

“苏州工业园已从‘招商引资’过渡到‘择商引资’了。”这是本报记者此前在苏州工业园区采访时园区有关负责人的话。

据介绍,园区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推手”,仅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园区不负众望,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吸引外资项目超5500个,实际利用外资282亿美元,93家世界500强企业已在区内投资了154个项目。

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给了苏州工业园区更多先行先试的机会,似乎又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新风口”。

截至目前,278平方公里土地已被优化为金融商贸区、国际商务区、科教创新区、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等功能板块,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的合理布局。

如果说在过去的21年园区更多是要引进外资,而在下一阶段,帮助企业“走出去”将是园区转型的方向。

# 成都高新区 2015年新增企业同比增58%

■ 龚友国

受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系列新政策实施、商事制度改革等多重利好推动,2015年成都高新区新登记各类型企业18196户,同比增长57.99%;新增注册资本(金)831.32亿元;新登记个体工商户4427户,同比增长34.31%。这也意味着,2015年成都高新区每天新增企业50家,每天新增注册资本2.28亿元。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创新发展的引擎,成都高新区2015年推出和实施了新的改革创新措施,积极探索建立与体制新区、‘改革高地’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有力提升了区域的宜业宜资市场和政策环境。”成都市高新工商局副局长孙秀蓬说,改革红利、政策红利与创业红利相互叠加,共同驱动了市场主体入区发展的热情。

2015年以来,成都高新区抓住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机遇,新出台了“创业十条”、楼宇经济政策以及稳增长、促发展“三大政策”,成都高新区新增各类在孵科技型初创企业3020家,同比增长300%,其中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180家,大学生企业和团队160家。成都高新区在孵企业累计已近6730家,孵化体系建设水平位居四川省首位、全国前列。

大学生创业同样方兴未艾。2015年,成都高新区新增大学生创业项目160个、大学生企业105家、青年(大学生)创业210人,大学生企业实现产值1.14亿元。

作为全国知名的“创新高地”,成都高新区一直不缺乏改革和创新“基因”。近年来,成都高新区先后推出多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措施,除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年检改革年报、放宽企业住所登记等“规定动作”外,还率先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成都高新区特色的创新举措。比如,在全省率先颁发“先照后证”营业执照,率先建成并投入运行“高新区先照后证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双告知”;在全省率先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三号”登记制度改革,去年1月颁发四川省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三号”营业执照;在全国率先实行小额经营社区备案制度,实现“双创”主体无准入门槛,已在全省、全市推广;探索集群注册登记模式,支持众创空间、蛋壳、优加、36氪等创客空间落户成都高新区,搭建创业创新服务平台。

# 在“产城融合”中 推进园区转型升级

(上接第十三版)

《中国企业报》:园区的“转型升级”是个热词,这一点在邹城工业园区反应强烈吗?未来五年,邹城工业园区的转型升级,有没有形成路径设计?

曾凡玉:“十三五”期间,我们要抢抓山东省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的机遇,全面对接参与西部经济隆起带和济宁市都市区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升工业园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具体做法上,要以荣信煤化、省化工研究院等龙头企业为依托,通过自主培育和招商引进相结合方式,积极培植壮大煤化工、精细化工等煤炭深加工产业,错位发展生物制药、化工新材料,将园区逐步发展为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条互补、功能设施齐备、集聚一体化发展的高端、综合化工园区。力争2016精细化工年产值突破200亿元,2020年突破500亿元。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关键环节,实施有方向、有策略、有目标、有重点的精准招商,推进招商引资与引技借智并举,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大的优质项目,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加大泰山玻纤、百隆纺织等外向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大力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

(上接第一版)

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是从高管到员工的“大部队”。与此不同,欧美跨国公司在华的分支机构,通常只有少数高管是其本国人才,大量员工和管理人员则都是中国本土人才。甚至有些中国区的“一把手”也都是“中国面孔”,比如,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惠普总裁孙振耀、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唐峻等等。之所以欧美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留欧留学生,他们熟悉欧美文化和中国国情,可以成为欧美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海外就没有大量的“留中”学生资源可用。数据显示,2013年底,我国共有1.53万家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了2.54万家境外机构,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人才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瓶颈性因素。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本土人才和教育资源严重缺乏,并且很少有家庭能够承担高额的留学费用。针对这些情况,中国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把外援资金重点向留学教育上倾斜,采取增加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吸引大量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培养更多的国外精英人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属地化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同比增长16%,尤其是民营企业正在替代大型国企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角。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民营企业都无法和大型国企相比,靠自己翻译国外相关法律几乎毫无可能,国家有关方面的“软支持”就显得更为必要。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成为热词,未来5年到10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保持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如果说亚投行等机构将在资金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足够的“硬支撑”,让中国企业有足够的“本钱”,那么包括法律翻译等在内的一系列“软支持”,则会让中国企业避开各种风险和陷阱,保证“本钱”的安全,防止巨额的资金“打了水漂”。